

# 东方名家

2011.5.2 星期一

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 观念平台

《独立新闻在线》

总编辑



庄迪影

媒体研究系的定位与路线，不是曲高和寡的哲学命题，而是关乎它能否及如何在至少数十个同类院系中鹤立鸡群？鲜明的学术定位、教研方向及杰出的师资队伍，是关键性辨识因素。

我 国大专院校的传播学课程深受美国主流功能主义媒体观及行为主义研究影响，以致过度偏好所谓的「实务技能训练」。我在2000年10月到新纪元学院筹办媒体研究系，同年岁末在《南洋商报·南洋论坛》发表五千余字长文《媒体教育：知识工程或技术训练？》，此文彰显新院媒体研究系的创系思维颇具企图心——立意在众多叫卖「实务技能训练」的传播学院中另辟蹊径，创建不止于培训工作人员和生产媒体工人，更要培养批判意识和学术理念，甚至能培育传播学人的传播学系，深耕我国的传播学研究。

批判新院媒体研究系在2001年初开课，次年崛起成为第二大系。由于师生对社会议题与媒体事件的积极介入和发声，媒体研究系很快就建立了口碑和「批判」路线的印象。

然而，何为「批判」？「批判」一词乃英文Critical之译，但这个不贴切的中译常造成人们误把形容词当动词，甚至以偏见和不屑的口吻把「批判」说成摆高姿态责他人。在新院媒体研究系的脉络里，「批判」路线除了是指指引介欧洲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之外，也意指培育学生具备敏锐洞悉与质疑之能力、「介入」媒体等公共事务之心态，以及与「权力」保持批判性距离之自觉。

引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欧洲批判理论，意在引导学生兼读两个大异其趣，甚至对立的理论体系，从中理解它们的哲学思辨，作为反思传播与媒体议题的思考工具。比起偏重「实务技能训练」的传播学课程，这更为全面和周延，补足学生学习视野的偏颇与局限。

我曾在《媒体教育：知识工程或技术训练？》一文里指出，媒体业界经常把

## 八方论见·原龙

自由撰稿人

中国总理温家宝来马访问是件大事，随行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和中国马来西亚研究中心主任吴宗玉教授都忘称赞马来西亚的中文水平高，是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之外中文保存得最好的地方。

身为大马人，这些赞语让我感到了自豪，飘飘然好不快活。想不到才不过一天，在首相署为温家宝总理举办的欢迎仪式上，大型的布景板上竟然出现莫名其妙的中文翻译句子，令我从云端直掉到谷底。「正式欢迎仪式，与他一起温家宝阁下

## 都是谷歌惹的祸！

的正式访问马来西亚」这种无厘头的句子，出现在如此庄重的场合，的确有失国体。仪式结束后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向温家宝就此错误道歉，虽然温家宝大方地表示不介意，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知他老人家心里会不会想：所谓中国以外的中文堡垒，原来徒具虚名！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国的中文水平还不至于如此不堪，任何华小六年级生，大概都能看出此句根本狗屁不通。这起事件只不过再次凸显首相官员的办事态度不认真，狂妄自大，不肯虚心向他人请教的弊病。很多人

# 办学不止于开课教学

###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十周年思索



擦亮一双明眸看破新闻自由

人才呢？传播学系应如何定位，应培养怎样的传播学系人才呢？

记者的采写品质欠佳和时事掌握能力不足归咎于学校的实务训练不足，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知识与思考的培育太少。可惜的是，不少传播学系讲师和主管走不出此盲点，拚命删减理论课、增加实务课，又拚命把同一门实务课细分为三、四门课——例如把《新闻采访与写作》拆出体育新闻报道、生态保育报道、财经新闻报道等科目。

## 言教、身教与实践

「办学」是兼含言教、身教与实践的复合式过程。开课教学是「言教」过程，对于开设什么课、课程内容为何，皆应有周延的思考，不是照抄同类学科的「样本」教程便宣行事。例如《媒体法规》课可以唱和官方论调，为各种媒体法规之正当性辩护，亦可剖析立法背后的政经利益和检验其对传播权的侵犯。再如《公共关系》课，可以仅仅是教导学生规划公关活动的技能，也能指导学生思索、检视公关活动的(不)正当性。这取决于授课者的学力与学术视角。

大学讲师「身教」之重要性不亚于「言教」，因为许多学子是在大专岁月里建立他们的世界观与志业，而讲师正是他

们此时的重要参照对象。讲师的终极关怀、向学心态、学术旨趣，乃至于对待权力精英的态度是阿谀逢迎抑或守正不阿，都能成为或好或坏的示范，影响至巨。

「身教」又与「实践」密不可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实践了些什么足以决定他们走上哪一条路子。新院媒体研究系的学生实验报纸《观察家》，意在让学生在社区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心志；而不是放任他们热衷报道吃喝玩乐的好去处和为商做免费的「置入性行销」。再如系办的活动，应着眼于深化学生对传播议题和媒体志业的思考与反省，而不是鼓励他们大搞各式各样的校园选秀活动，做商品化电视节目的「文抄公」(copycat)。

## 「加影学派」

选择哪一种实践或偏重哪一种实践，不仅攸关系办和为师者之格局，也攸关学生未来定向，不可未加思索而盲目为之。更糟糕的错误「实践」，恐怕就是向学生示范如何向掌权者和政客靠拢献媚。华社邀请官大人作为文化活动主持开幕的习性，早已为知识分子所诟病；曾几何时，以「批判」见称的新院媒体研究系，如今却

都知道，首相署有两位中文高手，他们就是首相的政治秘书胡逢山博士和首相副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  
如果负责官员有向其中一人请教一下，就不会犯此错误。再不然只要向国内任何一家华文报馆挂个电话，也不难得到正确的翻译。  
据说全程充当温家宝总理侍从部长的丹斯里许子根博士鉴于国家面子受损，已下令追究责任到底。追究归追究，由于我国官员的一大传统特色就是死不认错，看来也查不出什么结果。对呀，千错万错，都是谷歌网站的翻译软件出的错，可不是我的错！所以说，下次有幸德国或西班牙的总理来访我国，如果同样的笑话再次出现，那绝对不是奇怪的事。

不时成为官大人亮相指点江山的场合？  
新院媒体研究系元年，首届学生虽自嘲为「白老鼠」，但是师生士气高昂。无论是系会之成立与首办「世界新闻自由日研讨会」，抑或《观察家》之设计与生产，说是「师生共治」的结果并不夸张——《观察家》之名称就是系会首届主席刘为义的杰作。他们从中感悟媒体教育确有可能另辟蹊径，可以有很大的想像空间与开创性，为师者则扮演辅导的角色，让他们游刃有余而不入歧途。

十年前的雄心壮志还编织了「加影学派」(Kajang School)的鸿图愿景——把新院媒体研究系办成我国的传播学教研重镇，以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批判路径建构本土的传播学与媒体理论(theorising)，以及推动面向群众(尤其是华人社会)的媒体识读之火车头。

以此鸿图愿景为标杆，既不天真地期盼一蹴而成，也不无知地守株待兔。媒体研究系多管齐下铺设奠基工程，除了课程设置引入批判理论、定期举办学术或专题讲座，讲师们亦活跃于社会参与：系所建设方面则广纳不同学术背景的年轻学人，每学期增加一至二名专任讲师，以期在五年内建立一支至少十人的学术队伍。意欲开展但未竟之事，则是编纂契合本土脉络的传播学教材。

新院媒体研究系在5月2日至6日举行创系十周年庆典，迈入第二个十年之际，由系办主导，集思广益思考媒体研究系未来的建设与路径，应此举办风马牛不相及的余兴节目和游戏活动作为创系十周年庆典更具意义。媒体研究系的定位与路线，不是曲高和寡的哲学命题，而是关乎它能否及如何在至少数十个同类院系中鹤立鸡群？即便把范围缩小至只和拉曼学院、拉曼大学、南方学院、韩江学院及韩新传播学院评比，鲜明的学术定位、教研方向及杰出的师资队伍，仍然是关键性辨识因素。

这些因素是新院媒体研究系的「产品定位」(positioning)、「独特卖点」(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与「品牌策略」(branding)——虽然我极不愿意以市场行销的语言讨论教育与办学问题，但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和晓以大「利」，也许会有更多人听得明白、听得进去。

庄迪影是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创系主任(2000-2003)，现任《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